

# 传教士与中国现代文学

刘丽霞

( 济南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

[ 摘要 ]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传播策略, 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本文择要谈谈新教传教士成功翻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及其对中国新文学发轫的推动作用, 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编撰的《文艺月旦》( 甲集 ) 对现代文学的道德评价。

[ 关键词 ] 传教士 现代文学 《官话和合本圣经》《文艺月旦》

[ 中图分类号 ] I209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003-5281( 2006 ) 03-0119-05

## 一、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传播策略

本文所说的传教士是指近代从西方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在其发展过程中, 基督教自身又产生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宗派。不言而喻, 传教士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传教, 传教士与中国现代文学能够发生关联,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传播策略。

1840 ~ 1842 年的鸦片战争和 1856 ~ 1860 年的英法联军之役两次战争的结果, 是清政府与西方签订的两组不平等条约。在诸多的条款中, 传教自由占据了非常显要的位置。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们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在华自由传教的权利, 使基督教的在华事业不可避免地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因素混杂在一起。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否认, 来华传教士的许多人所从事的诸如开办学校、医院等工作在客观上是与中国近代化的方向相一致的( 主观上当然是为其传教服务的 )。因此, 近代基督教的来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传播和交

流的活动。

如果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看,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传播策略其实也是对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所开创的文化传播策略的继承和发展。明末清初之际,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面对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群体, 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教效果, 他们对来华传教的策略和方针作出了重大调整, 以适应中国社会的信仰传统和生存现实。概括地讲,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所采用的是文化传播的手段, 积极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 走上层路线, 努力与本土文化融汇贯通。如此, 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种文化传播的方式在近代传教士那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1807 年,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 1782 ~ 1834 年 ) 抵达澳门, 开始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 也揭开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一个新的时期。“早期基督教新教传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宣教的同时辅之以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传授。在明末清初时代, 耶稣会士曾经担任了沟通中西学术文化的桥梁作用, 近代以后, 新教传教士

\* [ 收稿日期 ] 2006-01-16

[ 作者简介 ] 刘丽霞, 女, 济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万方数据

则更多地承担了这方面的工作。<sup>[1] P. 106~107</sup>事实说明,这种文化传教方式使得新教得以广为流传。相比之下,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建立的文化交流传统,因为礼仪之争的影响,在近代天主教传教士那里基本被放弃了,而这也影响了天主教会的发展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直到20世纪初,以马相伯、英敛之等为代表的中国天主教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建立教会大学等人文传教方式,天主教才逐渐恢复耶稣会士的文化传教传统。总体而言,近代来华的传教士,通过其文化传教的手段,诸如翻译西方典籍、创办报刊、学校、印刷所等,为其传教服务。近代入华基督教会的这种文化传教策略,不仅促进了传教活动的广泛深入,也在客观上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传教策略,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本文择要谈谈新教传教士成功翻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及其对中国新文学发轫的推动作用,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编撰的《文艺月旦》(甲集)对现代文学的道德评价。

## 二、《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成功翻译及其对新文学发轫的影响

### (一)《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成功翻译

《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世界文化和知识宝库中的一部杰作,是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印数最多、流行最广、翻译语种最多的一部书。汉译《圣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便出现了许多《圣经》的中译本。最早的《圣经》中译本可追溯到7世纪的“景教本”,此后随着传教的需要,不断有各种译本出现。到19世纪下半叶,新教传教士为了切合普通民众的需要,开始用白话代替文言翻译圣经,这也是其注重文字传教的一个表现。

1919年2月印行出版的白话汉译圣经《官话和合本圣经》获得了极大成功。官话(今日称国语或普通话)是清末中国朝廷及各地官员使用的语言,也是中国全境日常使用的白话语言,其中“和合”二字不是指着中文说的,而是指着新教各教派对《圣经》中一些关键的词的正确译法及人名的标准音译达成的一致意见而说的。<sup>[2] P. 22~23</sup>

可以说《官话和合本圣经》在翻译上基本达

到了“信、达、雅”的较高成就。这个成就的取得与传教士们对白话语言的熟练掌握是分不开的。我们先看两位负责人的语言能力。《新约》汉译的负责人狄考文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近代传教史上和教育史上可谓大名鼎鼎,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就是由他创办的。此外,他的汉语水平也非常高,他编的《北平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首选的汉语入门书之一。《旧约》汉译的负责人富善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中文方面也有深厚造诣。1891年,富善累积了丰富中文知识,出版了一本《中英袖珍字典》,内里包括10400个汉字。另外又出版了一本《官话特性研究》,包罗了39000句汉语。这两本书成为当时西方宣教士和各国外交人员学习普通话的必备参考书。除了两位负责人以外,其他参与翻译的传教士也都无一例外,既精通圣经原文,又真正通晓中文。译经工作历时28年,到1918年才正式完成。在1919年出版时,原来的译经委员,只有富善一人得以看见这本中文和合译本圣经的问世,届时他已是82岁高龄了。此外,还有一批华人助手,也为翻译做出了贡献。这些华人一般都是传教士的语言教师或抄录员。因此可以说,1919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圣经》是西方传教士和华人助手合作的成果。

从《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成功翻译,可以看出新教传教士的文化传教策略之一,就是努力与中国本土文化融通,基于对中西语言和文化的精通,通过白话文这样一种适合中国普通民众的语言方式,使传教深入人心。事实说明,这种策略取得了很大成效。该译本面世不到10年,销售量已超过了其他所有中文译本圣经并逐渐取代了其他中译本,为中国教会普遍接受,这也是外国传教士在华集体翻译的最后一种版本的中文《圣经》。

### (二)欧化的国语文学成为白话文的适时范本

《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教内。换言之,汉译白话圣经的目的虽在于宣传宗教,并不在文学,可是因《圣经》本身是极佳的文学书,特别是它成功的翻译,为五四新文学的发轫提供了良好的范本意义和借鉴价值。

周作人在1921年发表的《圣书与中国文学》<sup>[3]</sup>一文中谈及了白话《圣经》汉译本对新文学语言建设上的积极促进作用。身为新文学领袖人物的周作人的意见,无疑值得我们重视。

作为中文圣经翻译中运用白话文最成功的尝

试《官话和合本圣经》与力废文言大倡白话的“文学革命”几乎同时出现,并被周作人视为新语言创作的典范,这绝非一种偶然。周作人在该文中认为,文学革命的主张时已提出两三年,且在社会上已经占了优势,但破坏之后的建设实绩却“几乎没有”,究其原因,“思想未成熟,固然是一个原因,没有适当的言词可以表现思想,也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周作人在经过一番比较之后,得出圣经汉译本之于新文学语言建设的借鉴意义:“前代虽有几种语录说部杂剧流传到今,也可以备考,但想用了来表现稍为优美精密的思想,还是不足。有人主张‘文学的国语’或主张欧化的白话,所说都很有理:只是这种理想的言语不是急切能够造成的,须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才能约略成一个基础;求‘三年之艾’去救‘七年之病’,本来也还算不得晚,不过我们总还想他好的快点。这个疗法,我近来在圣书译本里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参考与取法……白话的译本实在很好,在文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决怎样最好,指定一种尽美的模范,但可以说在现今是少见的好的白话文,这译本的目的本在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有意注重,然而因了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周作人所肯定的语言是“欧化的文学的国语”,而这正是和合本圣经所具备的,因此可供“参考和取法”。显然,这个关键词中包含了三个义项,即“欧化”、“文学”和“国语”。“国语”自不待言;文学性作为《圣经》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有目共睹的。《官话和合本圣经》尽管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仍在整体上很好地传达出圣经文学的艺术性,正如周作人所说:“这译本的目的本在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有意注重,然而因了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

似乎有疑义的是“欧化”这一义项。其实从1930年代左翼作家提倡大众化运动一直到1980年代,关于语言的欧化都是一个引起争论并遭到批评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辩证看待的问题。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曾自觉地学习欧化语言,并把它与学习西方的思维方式乃至文化精神相联系。中国传统的语言比较短,且传达主要靠意会,虽然读来容易、内涵丰富、富于张力,但缺乏逻辑的清晰性和意义的明晰性。西方语言则有一整套逻辑严密的语法体系,大句子里面套有小句子。这种结构复杂

万方数据

的语言范式,实际上反映了思维方式的严密性。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里,曾谈到翻译的目的,即“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sup>[4] P.382</sup>。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语言太贫乏,太不精密,而语法的不精密,就证明了思路的不精密,所以他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应该引进大量新的成分,包括欧化的语法结构。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语言上就体现了不同于传统语言风格的欧化特点。陈思和在分析《狂人日记》时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认为鲁迅的语言在中国传统语言的生动性、多义性的基础上,融会了西方语言的精确性,开创了一种可称之为“欧化语”的新语言,并肯定了鲁迅的欧化语言在表达其深刻思想上的积极意义<sup>[5] P.67</sup>。笔者认为,语言适度的欧化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确实有助于表达较为精密、深邃和复杂的思想,应该否定的是那种食洋不化的令人读来云山雾罩的所谓欧化。而且,较之于新文学伊始,今天语言的欧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学语言中,并自然而然地被接受了。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肯定《官话和合本圣经》中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就容易理解了。

总之,对于力废文言大倡白话的“文学革命”而言,《官话和合本圣经》成了适时的范本,在新文学初期起到了催化和示范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包括新文学领袖人物周作人的肯定,使得白话文在文学领域的胜利也提高了白话圣经的地位。这样一种互动双赢的结果,正是新教传教士文化传教策略的成功之处。

### 三、《文艺月旦》(甲集)对现代文学的道德评价

20世纪40年代,天主教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传教的改革步伐,力图恢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文化传教传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批多年生活在中国、熟悉中国现实的传教士编辑出版了《文艺月旦》(甲集),其中载入许多关涉中国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文艺月旦》(甲集)原为法文,名为《说部甄评》,但此书并不都是小说,还杂以剧本、随笔、诗歌等。编者一方面在法文版中保留这个名称,觉得它所代表的是全书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全书的实际内容;另一方面,1947年,由北平太平仓普爱堂出版的中文版中采纳了读者

“名不副实”的批评意见,将书名改为较为笼统的《文艺月旦》。本来编者打算出多集,但目前仅见甲集。《辞海》中对“月旦”一词的解释是——《后汉书·许劭传》:“初,劭与靖(劭从兄)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因称品评人物为“月旦评”,省称“月旦”。

《文艺月旦》(甲集)的执笔者不止一位,但善秉仁是其中的主要作者。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此书编者都是天主教士,且都在中国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善秉仁是比利时的传教士,也是当时一位有名的汉学家,对当时中国的文化与文学都是比较熟悉的。

正如编者所说,在一般人心目中,传教士的传教生活,同艺术作品几乎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编者其实在此编印过程中仍保留了他们传教士的本色。因为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图书的道德批判,藉图书审查维护天主教的道德风化,并试图借此移风易俗,影响中国的道德建设。目的明确性决定了该书不可能是一本常规意义上的文学读物批评,不过,该书的“序”(1947年3月19日)和“导言”(1945年11月1日)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致看法。在此,我们将就其作一番简要的介绍和评价。

总体而言,编者认为,以现代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是消极和负面的。编者对现代小说的看法,无疑是建立在天主教的道德伦理观基础之上的。以下将从几个方面具体探讨编者的现代文学观。

#### (一)大多数新文学作品中的显著的革命思想

编者认为,“革命思想”是乍读许多新文学家之作品时,可以明显看出的一个共同特点。比如鲁迅,其愿望是解放民众,想让他们摆脱传统的政体,他要唤醒群众,使他们能够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为此目的,他攻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一切迷信和封建礼俗。巴金在几乎所有的作品里都宣扬革命信念,想实现一个“梦境的人间世”。他书里的主人翁,一般都是令人同情的,生活都有点凄惨,因而他们要求一个新的人类社会。为此,他建议旧家庭革命,甚至反抗父母,他的人物为达到此种理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其他共产主义作家,像丁玲、陈独秀诸人的著作里,则革命精神更为显著……

概言之,新文学作家有种普遍的革命情绪,而

且在某些作家的作品中还有共产主义色彩。他们主张解放民众,废除旧家庭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编者一方面承认这些思想是义勇的,不想不假思索而根本反对这类主张,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思想是可虑的,担心青年们只记牢“破坏一切”的口号,单记住必须摧毁旧社会旧道德的构造,却忘却了必需的自我牺牲,忘掉本身的重要使命,那就糟了。

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天主教相关的基本教理。天主十诫(Decalogue或Ten Commandments)是天主教徒伦理生活的基本准则,其中第四诫是“孝敬父母”,它要求子女对父母尽孝心,在物质方面要满足父母的生活所需,在精神方面要尊敬父母,听从父母的劝告。编者对新文学作品强烈废除旧家庭制度的要求表示了忧虑和反对,因为中国的旧家庭制度中也是极其讲究孝道的。同时,这一诫命也针对下级和上级、学生和老师、公民和国家等的关系。

天主教对社会改革一直持审慎态度,天主教传教士给中国社会所开的改革药方是天主教的信仰观以及此原则之下的具体主张。天主教传教士的社会改革观是相对保守的,对激进的社会改革持反对态度。基于此,传教士对共产党人及其共产主义主张,也基本持反对态度。当然,这也与共产党人一度反对基督教的态度以及蒋介石的宗教立场有直接关系。蒋介石对基督教的支持使得天主教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比较柔和,二者之间有对话的平台,并容易结成利益同盟。

#### (二)新文学界普遍的非道德观

编者认为,包括鲁迅、茅盾、丁玲在内的多数文学界领袖人物无所谓道德观念。尽管不能说一般大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是这样,但他们的“主要格调”确是如此。在他们的心目中,婚姻制度是腐朽的,他们一致主张自由恋爱。他们让他们的故事中的人物,生活在最彻底的不道德里。同时,他们也率直实验他们的理想,由他们所创造的人物的生活方式,转示出他们对人生、离婚、自由恋爱的看法,并显示出他们对贞操观念的满不在乎。还有一个被编者称为“非文学作家”的流行一时的群体,以张恨水、刘云若等为代表,在道德立场上更加受到指责。编者认为,他们是一些天分有限、写作目的并不为宣传思想或发动斗争而专为牟利的人。这些作家往往是多产的。他们认识大众,熟悉他们的偏好,所以他们的著作,只是些揣摩人民心理,投其

所好的东西。只要人肯看,能增广销路,能多卖钱就好。他们的作品在不等的程度上都涉及色情。这些文人,虽无材具,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大。

编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批判许多作家的非道德倾向,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思想观念与天主教的道德观有极大的矛盾。天主十诫中的第六诫是“毋行邪淫”,它命令人在行动和思想上保持“洁德”,正确处理性欲问题,端正两性关系。这一诫命禁止在婚姻以外寻求性欲的满足。因为在天主教看来,性欲和生育有关,负有延续人类生存的使命,在婚姻之外寻求性欲的满足是不正当的。这一诫命同时禁止人们思想上的邪念、邪欲,尽管它并不产生实际的危害。

对于婚姻,天主教是非常尊重的。天主教承认异性间的相互吸引是正常的,而婚姻是使两性满足性欲的合理、有节制的方法。婚姻是一件人生大事,结了婚,则木已成舟,惟有对方的死,才能解除的。而离婚就像是断肢手术,仿佛把一些本是活活连在一起的肢体割下来。事实上,旧约圣经用的“离婚”这个词,就是“断肢”的意思,可以指把树枝从树干上砍下来。基于此,编者对新文学界的恋爱婚姻观持批判态度。

当然,编者在批判大多数新文学作家非道德立场的同时,也肯定有一小部分作家的作品,在道德观上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不曾陷入上述错误,并且能产生良好的影响。他们抗拒了诱惑,在其作品中,流通了些“鲜洁之气”。他们的全部著作,或几乎全部著作,可以让任何人去看,比如皈依天主教的苏雪林和张秀亚,基督徒冰心和非教徒的叶绍钧。另外,还有新文学领袖中的巴金、老舍等几个例外人物。

### (三)大多数作家对彼世的否定观

编者认为,对于大多数的作家,神是不存在的。不少作家明确否认有神,他们想象不出什么是一个不死的灵魂,天主教也只是个外来的帝国主义的教门。因而,无神主义在青年群里的扩散是毫不奇怪的。在一般的作家著作里,都谈不到宗教问题。本来宗教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综合,是人向神缴纳从属的奉献。但在他们那里,尘世只有为己的尘世,大可不必在意自己与自己所从属的另一高级权力间的关联。某些作家还认为,人生在世的目的,无非是求个人享受。这是他们反抗既定制度、反抗宗教与贞洁所必定会产生的结论。

另外,编者认为,许多作家倡导革命时,往往是

受了爱国心、抵御外来暴力的情感所致;他们所要求的往往是一种较为合理的人生(例如鲁迅书中的主人公、曹禺笔下的人物等),他们所需要的是理想,他们想建造一个新的人类社会,并不惜为此而牺牲生命(例如巴金笔下的人物)。这些,一般都是出于善意。他们的著作的天然意向,是毁灭固有的一切,鼓励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可是,轮到重新建设时,他们却完全失败了。这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在他们的作品里没有神的存在。因此,他们不能走上康庄大道,也不能替他们的读者指示应遵循的正路,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认识到“真理”。

这个问题关涉到天主教的信仰核心,所以编者的批判也是严厉的。天主十诫中的第一诫即为“钦崇一天主万有之上”。天主教对天主的尊崇和对彼世的肯定,必然使编者在面对无神论者或否定基督教的作家时持批判的态度。但处于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面对此世的巨大压力和迫切要求,让作家把目光投向彼世,恐怕也不是一件现实的事情。

概而言之,《文艺月旦》体现的天主教传教士的中国现代文学观,是笼罩在浓郁的天主教道德伦理观之下的。一方面,它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观照视角,拓展了我们的认识视野;但另一方面,它又过多地受制于天主教道德伦理立场,难以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真正全面而公允的评价。从文化传教的角度来看,近代天主教传教士虽力图恢复利玛窦式的传教政策,但由于受清代礼仪之争的影响,与本土文化的融通程度较之明末清初明显降低,因而更多强调天主教的原旨性,并试图以天主教的道德伦理影响当时的中国社会。

### [参考文献]

- [1]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2] 魏贞恺. 和合本圣经与新文学运动[M]. 金陵神学志(复),1995.
- [3] 周作人. 圣书与中国文学[J]. 小说月报,1921(1).
- [4] 鲁迅. 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5] 陈思和.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Z].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哈布尔)

# 传教士与中国现代文学

作者: [刘丽霞](#), [LIU Li-xia](#)  
 作者单位: [济南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刊名: [内蒙古社会科学](#) [PKU](#) [CSSCI](#)  
 英文刊名: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06, 27(3)  
 被引用次数: 1次

## 参考文献(5条)

1.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1996
2. [魏贞恺](#) [和合本圣经与新文学运动金陵神学志\(复\)](#) 1995
3. [周作人](#) [圣书与中国文学](#) 1921(01)
4. [鲁迅](#) [鲁迅全集](#) 1981
5. [陈思和](#)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 2003

## 相似文献(10条)

1. 学位论文 [郭晓霞](#) [性别、族群、宗教与文学——妇女主义圣经批评视野下的五四女性文学研究](#) 2009

五四女性文学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的开端。五四女性文学的研究进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性别角度对五四女性文学做内部研究,这种研究忽视了五四女性文学的外部联系——基督教文化;二是将五四女性文学从属于现代文学,整体研究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这种研究忽视了五四女性文学的性别主体特征。为准确而深入把握五四女性文学的特质,必须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就外部而言,五四女作家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从传播学角度看,在基督教文化传播的链条上,作为传播者的西方传教士对于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他们为吸引广大中国妇女入教,抨击中国陋习、在中国办教育、兴女学,并对基督教进行了适应性调整,突出尊重妇女、民主平等的思想,对中国妇女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反抗父权压迫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优越感,其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姿态使中国妇女在欲迎还拒的心态下接受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经传教士的传播,最终到达了接受者的头脑中,而基督教文化能否被接受者接受以及接受的程度,还取决于接受者及其所受到的多种影响。就五四女作家而言,她们大都接受过基督教文化教育和影响,同时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加上个体独特的经历和情感体验,因此,五四女作家尽管在理智上对基督教文化欢迎还拒,但在情感上对基督教文化抱有好奇,并有一定的依赖性,有的还皈依了基督教。因此,五四女作家和基督教文化具有密切关系,基督教文化深深影响了五四女作家的创作。

但是,五四女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体验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性别特征。五四女作家身份上的这一特点和第三世界的妇女主义者极为相似,五四女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和表现与第三世界的妇女主义者对圣经的批评具有内在的关联。她们对圣经和基督教文化的认识基于相似的经验——本土妇女经验,包括民族经验,本土宗教、神话、文化遗产,女性的经验三个方面。她们都关注相似的主题如以上帝的性别问题为核心的“上帝论”,以耶稣的性别问题、耶稣与妇女的关系为核心的“基督论”,以两个与“罪”相关联的女性夏娃、马利亚为中心的“罪论”,以男女关系、人类关系为中心的“人性论”等。因此,妇女主义圣经批评研究五四女性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撑。由此,转入内部研究,探讨五四女作家接受和表现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独特性。

关于“上帝论”,尽管中国自古就有“上帝”这一观念,但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上帝”观念和“上帝”形象却具有基督教的文化因子。在时代影响下,五四女作家舍弃了基督教上帝学说中不合中国观念且不合常理的神秘部分,在创作中表现了更具情感色彩、人格色彩、性别色彩的上帝形象,主要有造物者、母性或女性的上帝、圣言的倾泻者、精神寄托的对象等上帝形象。关于“基督论”,五四女作家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一样,并不认为耶稣具有神性,而将耶稣看作一个有着伟大人格的人。但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女作家从本土妇女经验出发,看到了男性耶稣身上所具有的女性品质,如自我牺牲、受难、宽恕、博爱等,所以,她们更愿意把耶稣当作一个女性基督。五四女性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女性基督形象,其意义在于:以耶稣的男女平等思想和女性基督形象对抗父权等级思想,并最大限度地肯定女性的传统价值。和耶稣关系最密切的女性是耶稣的母亲马利亚,传统父权制社会却将马利亚打造成一个个谦卑、顺服、自我牺牲的母亲典范。五四女作家从自身处境出发,将马利亚看做一个世俗的、现实中的母亲,对母爱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歌颂,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光辉色彩的母亲形象。这表明,五四女作家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传统文化影响,观念比较保守,缺乏审母意识。与圣母马利亚相对立的基督教女性是夏娃,在父权制思想下,夏娃集邪恶、软弱、欲望、无知等特征于一身,但在五四女性文学中,夏娃成为反叛封建大家庭、追求爱情和个人意识的新女性的同义语。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夏娃舍弃了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愚民思想,大胆而执着地追求知识,探索人生意义,追求个体价值,积极而不激进。这一形象特征反映了中国女性温柔而敦厚的品质以及中国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同盟关系,独具中国特色。五四女作家还对基督教的人性论、人与人的关系进行了独特理解和表现。在基督教博爱思想影响下,五四女作家表达了建立超越性别、种族、阶级和不同见解的姐妹情谊的理想。她们描写了多种形态的姐妹情谊,但无论哪一种姐妹情谊,都是现代女性实现自我意识觉醒与寻求自我解放的一种途径,也是现代女性用以对抗男权专制而建构的一种女性文化理想,既有现实的积极意义,也有幻想的乌托邦色彩,尤其其中的女性同性之爱,透露出女性性别建构的逃离。但是,五四女作家最终超越了性别建构的逃离,将关注范围投向更为广泛的男人与女人、人与人的关系。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五四女作家对妇女解放运动大都持温和态度,没有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男性,而是将男性看做妇女解放的同盟军。她们试图通过有效地处理好家庭与事业的矛盾,与中国男性一起建造一个男人与女人、人与人的和谐的伊甸园。

以妇女主义圣经批评理论研究五四女性文学,最终揭示了性别、族群、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张力关系。五四女作家和中国现代男性知识分子一样,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认识、诠释和接受基督教文化,使基督教具有了中国特色。但是,五四女作家受自身性别的影响,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明显又不同于男性作家。她们对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和教条不自觉地做了调整,以适应自身情感的需要和女性的性别体验,使基督教具有了中国妇女的特色。这一特点在她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好体现。

2. 期刊论文 [刘丽霞](#) [从〈文艺月旦〉\(甲集\)看天主教传教士的中国现代文学观 -广西社会科学2003,“\(2\)](#)

《文艺月旦》(甲集)是20世纪40年代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所编写的一本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编者立足于天主教的道德伦理观,对现代文学的许多作品进行了简要的道德评介。此书的序和导言对中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并就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加以探讨,拓展了我们的批判视野。但无疑,囿于道德立场,其结论带有浓郁的天主教道德伦理色彩,难以对现代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

3. 学位论文 [王海燕](#) [译介学视角下的《圣经》汉译史](#) 2006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汉译《圣经》在早期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它对汉语言的影响,尤其是对白话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中的地位等诸多问题上,我们国内的相关学者还是充满异议的。就目前来看这个争议似乎仍然缺乏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本文拟从译介学视角

初步探讨并试图澄清这方面的有关异议甚至有意抑或、无意的偏见。有专门的章节来讲述早期传教士翻译《圣经》之举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译成汉译《圣经》的创举。在众多译本中，《官话和合本》对后来中国大地上的兴起的新一轮新文化运动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推动作用。

译介学，指的是一种广义上的翻译理论。该理论是由20世纪30年代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而来的，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成型。一开始，译介学主要以比较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文学。它不关心翻译中语言层面的语言转换，而是关注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手段所特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在此意义上，本文拟从一个更加宽泛的视角来考察《圣经》汉译史。跟以往的传统翻译观相比，译介学方法注重于以下几点：早期西方传教士所翻译的《圣经》的质量好坏不是译介学的研究重点，而中文《圣经》版本对中国文化和语言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关注的焦点。它所注重研究的是汉译《圣经》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载体而对这场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作用—汉译《圣经》它自身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如何帮助当时的中国人从此可以便利地进行交流，以及它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所作出的不可否认的贡献。与此同时，本文还继续讨论了在这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不尽人意的矛盾和问题，即广义上的中国礼仪之争和狭义上的名教翻译的混乱情况。由此引出文化互动转型论，这也是本文的哲学理论基础。

因为本文是从译介学——一种比较文化角度出发的理论来探讨汉译《圣经》的，因此最近汉译《圣经》的发展情况和发行情况也有必要作一了解。

最后，文章简要说明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开展新一轮中西文化交流应注意的事项并对全文作了总结。

#### 4. 期刊论文 [宋莉华 西方传教士汉学的分支: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现状 -国外社会科学2008,“\(5\)](#)

传教士汉文小说长期被学界忽视,近年来有关的研究取得相当进展,哈佛大学韩南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陈庆浩、韩国崇实大学吴淳邦等用力尤勤,目前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并取得初步成果。此项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思考和理清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发生的源流,也使我们能够更客观地评价晚清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得失和历史地位。

#### 5. 期刊论文 [袁进. Wang Keyou. YUAN Jin. Wang Keyou 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文学研究2009, 3\(2\)](#)

新文学主要运用的是欧化白话,它与古白话是不同的,欧化白话的文学作品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问世,它是当由西方传教士书写的,有诗歌、散文和小说。西方传教士还是国语运动的早期推动者,它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构成一条国语运动的发展线索。结合晚清“新小说”运动和“文学救国论”的西方传教士影响,可以说西方传教士曾经对中国近代的文学变革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一影响以前被我们低估了,因此受到忽视,由此需要调整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视野。

#### 6. 期刊论文 [叶蓉 《圣经》对现代文学及文革后几位作家的影响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4\(6\)](#)

自唐代景教入华以来,传教士们从未停止过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和合本《新约》与《新旧约全书》分别于1905年和1919年出版,其语言形式直接影响了白话文运动,《圣经》故事及文学体裁也常被现代文学作家所采用。当“五四”知识分子意识到基督教文化不过是救国救民的一轮幻想的太阳,他们便很快放弃了这一工具。文革后的作家遭遇了十年浩劫,他们不再像现代文学作家那样以实用主义态度来看待基督教,反而在内心深处对基督教言说了共鸣。

#### 7. 学位论文 [朱云生 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2006](#)

中国文化在重大转型期总要与外来文化产生激烈碰撞,这种碰撞常常通过翻译启动。汉代末年,佛教经典陆续经过翻译输入中国,佛经中的文学因素对隋唐文学思想、内容、文体、语言都产生过不少影响,阿含部的佛教经典催生了我国的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奇。公元16世纪末到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进行宗教活动,曾经将《意拾喻言》(现译为《伊索寓言》)作为教义宣传品介绍到中国,同时也向中国译介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翻译的特点是域外文学被大量翻译到中国。

清末民初翻译文学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中国文学世界化的趋势正是在这一文学翻译热潮中开始的。民国学界对翻译文学已有不少关注,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史著都设有“翻译文学”专章。但自1949年以后,长期尊奉的“五四”白话文学一元论及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功能观的影响,翻译文学和其他具有丰富生命力的文学资源一起被遮蔽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界对于现代性反思的逐渐深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历史的地位和文学生态越来越凸显出魅力和价值,“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更是把翻译文学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郭延礼、王宁、高旭东、张德明、高玉等先生曾刊出一批学术含量深厚的成果,并热切呼唤重视20世纪特别是翻译文学的研究。确实,学界系统性地对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转换中的位置恰当定位、比较全面地清理翻译文学与当时文学变革间深刻关联的著述至今仍寥若晨星,在“20世纪比较文学史”著作中,也根本没有贯彻宏阔的比较史学的眼光,把翻译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之中。

本文以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为理论基础之一,以中国文化—学现代转型为理论支点,把翻译文学放在20世纪初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思潮、文学观念、哲学流派下进行考察,运用文化背景分析、比较分析、风格分析等,特别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比较文学最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从翻译文学与现代新知识群落的形成、翻译文学与文学观念变革、翻译文学与现代文体格局的开创,涉及翻译文学与现代传媒的互动、翻译文学与文学历史功利性追求和审美现代性的发端、翻译文学与汉语现代化等各个侧面来探索文化语境下域外文学通过翻译怎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发生的意识支撑、理论支援、价值观支撑,怎么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形态的生成,并尝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提出理论批评,并从中国文学“西化”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角度对当下文艺生态建设提出自己的看法。论文着重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文学”中取证,当然纳入论者笔下的例证涵盖面,在理论上不仅包括理论意义上“翻译文学”的全部,也包括介绍到中国来的、关涉到现代文学现代性生成的外国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杂志等等,也包括文学翻译的理论引导和翻译活动的动态性探求。

#### 8. 期刊论文 [李春雨 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传播方式现代变革的影响 -中国比较文学2004,“\(4\)](#)

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出版的发端远远早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在1900年以前,中国近代出版业即已进入了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并向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演进,其提供的新兴都市文学刊物—报纸副刊、文学杂志和平装书籍,早已为日后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建立了市场和读者群。

#### 9. 学位论文 [唐宏峰 “小说”：现代性叙事的奇遇——吴趸人与晚清小说的兴起 2005](#)

本文以晚清小说家吴趸人的写作为个案,探讨小说如何在晚清崛起、小说怎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文类。本文认为要想揭开晚清小说兴起之谜,在把握晚清社会的政治状况危机、“小说界革命”、报刊传播媒介推动、市民读者阶层的形成等等外在因素之外,还要看到小说文类本身的现代性意义。这种意义直接表现在,晚清小说的兴起实质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性文类的兴起。彼时“小说”,在一种复杂的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冲突中,是一种不同于古典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兴起的叙事文类。这种全新的文类承担了对于“现代个体”和“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己和国的两端参与现代性的价值建构,成为现代性叙事的最佳载体。这才使其能够担当现代文学的中心文类。本文通过四小节来展开这一思路:

第一节《当“小说”遭遇novel的时候——一种全新的现代性文类的产生》,首先列举了卢卡奇、巴赫金等理论家对于novel的现代性文类性质的判断,并梳理纷繁复杂的中国“小说”源流。这种“小说”与novel的天渊之别,在晚清首先通过翻译而被抚平、遗忘。大体经由早期传教士——日本政治小说——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跨语际实践,“小说”与novel对等关系建立。从此中国小说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构成一种新的现代性文类。

第二节《返回现场——一个小说家的诞生》,通过晚清小说家吴趸人的生平经历,勾勒晚清小说得以兴起的社会思想环境。上海所提供的都市现代性,培育了吴趸人这样的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清末十余年的民族危机,尤其是文化危机,是吴趸人采取保守思想的主要原因,而小说写作成为他表达和化解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文化危机的的重要途径;最后,本节勾勒吴趸人的交友活动,探讨他与李伯元、周桂笙、梁启超的关系怎样影响了他的写作,同时也为晚清文坛描画一个侧面的踪影。

第三节《边走边唱——吴趸人小说中的叙述者和旅行者》,发现吴趸人小说中的两个突出形象——叙述者和旅行者——常常合而为一,构成一种旅行叙事。介入式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限制叙事,放弃权威的说话人口吻,构成现代社会和现代个人的隐喻。而吴趸人的旅行者做的是一种特殊的寻求认知的心灵之旅,旅行的过程同时也是建构自我的过程,这就构成了一种可贵的“成长的人物”形象,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要素对于小说文

体的塑造。同时，旅行者的成长与历史时间而非自然时间紧密联系，个人成长与历史巨变结合在一起。

第四节《“魑魅魍魉”与“文明境界”——吴趼人小说中的国族想象》，吴趼人的小说，有两种对“中国”的想象，一种是充斥“蛇鼠虫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的吃人寓(预)言，一种是作为科技强国与道德至境的科幻乌托邦。在后一种中，小说纠结了众多复杂的因素，科技与道德联姻，文明与专制结合，在物质累积的意象中，甚至还暴露出帝国殖民的幻想自慰。

结语，吴趼人的保守思想与艺术实验之间的矛盾，尤其体现了小说文类所具有的现代性张力，表现出小说叙事本身对于作家有限的主观思想的超越。同时，结语部分对王德威的研究思路作一简单评述，进一步思考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 10. 期刊论文 杨枫 鲁迅“反传统”辨析:对西方后殖民主义“鲁迅观”的反诘 -鲁迅研究月刊2004,“(3)

1西后殖民主义标榜的“东方主义”所确立的“鲁迅观”，认为中国作为“晚生外发”被动现代化国家，发生的“五四”思想文化变革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体现的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后殖民性质，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鲁迅为改造国民性的“反传统”，是受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著作的影响产生的，是西方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典型体现<sup>①</sup>。

### 引证文献(1条)

1. 刘丽霞 从《教务杂志》看新教传教士对新文学的评介[期刊论文]-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mgshkx200603030.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mgshkx20060303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2b54ecee-5fdd-4333-ba07-9e4d0094ded2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